

#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及现实意义

□乐承耀

## 本期特稿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对华中敌后乃至全国抗日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四明大地的英勇儿女为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抗击敌伪付出了巨大代价。今天，当我们纪念70年前宁波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使正义战胜邪恶的光辉历史时，不仅要铭记先辈们的英名和业绩，而且要总结和宣传浙东抗日根据地宝贵的历史经验，弘扬四明山革命精神，汲取前行的力量。

### 一、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维护祖国利益

浙东抗日根据地给我们提供的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是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维护祖国利益。

爱国主义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爱国主义首先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积极抵御外敌入侵和外来威胁。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紧要时刻。面对强大的敌人，爱国主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保卫家乡的山山水水不受敌人侵犯，同仇敌忾，竭尽全力，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勇往前进，视死如归，保家卫国。

正是爱国主义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浙东共产党组织实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策略。谭启龙在《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方针》中强调，“团结浙江敌后各党派人士、各友军、各地方政府、各阶层人民、各宗教团体，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为坚持浙东敌后斗争、建立根据地而斗争”。浙东共产党人依靠人民，团结抗日，即使对国民党顽固派，也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并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最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民，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浙东敌后战场的抗日勇士，一面建立根据地，一面参加战斗，担负抗击浙东的日军主力 and 歼灭伪军的斗争，支援和配合正面战场。他们为国为民，誓死抗战，英勇杀敌，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和爱国精神。戎马驰驱金萧的朱学敏、碧血洒四明的陈洪、浙东人民的好儿女李敏等，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无数党的干部、浙东游击纵队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浙东抗战中，光荣牺牲的干部有四明地委书记兼南山自卫总队政委陈洪、纵队政治部科长邱子华、浦东支队政治部主任曾平等200余名，牺牲战士788名。浙东军民正是发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凭着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使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屹立于东海之滨。

### 二、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浙东抗日根据地给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历史经验，是发扬我党提出的“密切联系群众”作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疾苦。

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事关革命事业能否取得胜利。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关注民生，为群众办实事。浙东共产党人始终把密切联系群众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1942年7月18日，在慈北宓家埭召开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浙东区委委书记谭启龙作《目前国内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分析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把浙江群众与我党有过血肉相关的联系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并号召组织敌后广大民众为适当改善生活而斗争。

1942年11月30日，浙东区委发出《关于开展与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强调共产党和人民是“生死相关，血肉相联”。并指出：“我们要在浙东敌后站稳脚跟，建立起长期坚持斗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我们只有进一步的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能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建立起坚强的群众基础，任何困难环境都可战胜，任何困难都可克服。浙东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广大指战员身体力行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把发动农民、盐民及沿海渔民和知识青年等广大群众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宣传工作，提高人民组织的积极性；建立“三三”制政权，组织民众团体；实行“二五”减租，发展经济，增加工资，救济难民灾民，提高人民生活，改善人民生活；实现抗战民主普及教育，为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无论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中，还是在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千方百计地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浙东人民正是从实际体验中认识到我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的抗日与爱护人民的军队。浙东人民群众由此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积极拥护、支持浙东抗日游击纵队。谭启龙在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50周年时，曾满怀激情地说：“根据地军民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令人终身难忘。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我们，养育了革命。”

### 三、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民主政治、依法理政有机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领

导、发展民主政治、依法理政有机统一，使根据地民主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这一历史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人民政权、发展民主政治方面就有过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主要围绕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来制定。基本内容为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基层民主。诸如，畅通民主渠道，实施选举、议事、公开机制，推进协商制度和监督制度，重大决策征求各阶层人民意见，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论、出版自由，允许在各种会议上的畅所欲言等。可以民主选举为例，1943年12月29日，华中局来电指示浙东区委，认为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是迫切需要的，要以坚持敌后抗战，实行民主作为号召。为此，1944年11月，浙东区委向下属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推选代表，把各界人士中有代表性的、支援抗战的人士推选出来。四明、三北地区代表采取普选方法推选代表，其它地区代表采取协商办法推选。1945年1月21日，代表大会在余姚梁弄召开，按照“三三制”原则，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浙东行政委员会，同时成立浙东行政公署，县、区、乡级政权机构亦民主选举产生，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正如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所说：“区长都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根据地的人民第一次行使了自给的主权力。”浙东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浙东抗日根据实施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互相保证。加强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浙东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先后建立，使辖区内有行政司法机构，为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切实加强法制建设。1944年，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发布《施政纲领》，1945年1月，又对临时行政委员会发布的《施政纲领》作了调整和充实，通过并颁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计21条。《施政纲领》在政权建设、抗日武装、公民人身权利、税收、农业、工商业、土地政策、文教、妇女、婚姻等方面提出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对民众的民主权利予以保护。依据《施政纲领》，还颁布了具体法律法规，诸如《浙东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关于财政开源问题的指示》、《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三十三年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办法》、《浙东行政公署抗租条例》、《浙东银行条例》、《浙东行政公署减租交租及处理其他佃业关系暂行办法》等法令。

浙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和法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实行民主和依法治理的根本保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坚持和完善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议，支持浙东临时参议会履行权力机关职能，积极进行政治协商等。浙东区委还通过民主程序，把党的抗日主张转化为政府意志，进而变成浙东人民的共同行动。积极维护浙东地区施政纲领的权威，明确提出“凡我浙东行政机关内之共产党人，应遵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并号召“全浙东共产党员为此一纲领的实现而奋斗”。正是坚持党的领导、民主政治与依法理政的有机统一，充分调动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团体和群众积极性，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敌后抗日政权得到巩固。

### 四、廉洁奉公、反腐倡廉，筑牢防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浙东抗日根据地给我们提供的又一历史经验，就是廉洁奉公、反腐倡廉，筑牢防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浙东地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了“反腐倡廉”的思想。《纲领》指出：“励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同时改善公务人员之待遇，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共产党人有犯法者，从严治罪。”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在浙东临代会上《施政报告》中也提出，要使浙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抗日廉洁政府”，会议还通过了《浙东行政公署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了廉政建设措施。考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反腐倡廉的措施与实践，可以看到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廉政机制。

首先，建立了权力约束机制。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是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重要手段。浙东抗日根据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合理设置政权结构，形成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一是浙东根据地设立最高权力机关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各县有同级参议会。参议会同级行政机构领导人，和司法部门负责人有选举、罢免、弹劾的权力。二是政府执行同级参议会决议并对其负责。三是司法部门由同级参议会监督。这种权力机制既是民主的，有利于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又是集中的，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

其次，实施思想教育与制度防范相结合的预防机制。浙东抗日民主政权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着重于加强思想教育，打下廉政建设的思想基础。浙东区委和浙东行政委员会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通过“教导队”和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教唱《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从党性和世界观的高度来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建立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主要是制定各种有防范性的规章与机制。一是制定有关行政人员的规章。1945年1月颁布的《浙东地区施政纲领》成为规定浙东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纪律，要求工作人员公正廉洁，行政机关成为“抗日廉洁政府”。二是建立各种财务制度，以堵塞财政工作中漏洞，防止贪污浪费行为发生。1944年10月25日，谭启龙在《目前形势下我军今后的任务》中提出，在实施供给制度过程中，要“确定经常的预决算制度。要在部队中建

立审计工作”，确定“严格按月审计的制度”，“反对任何贪污浪费”。三是建立监督机制。实行廉政，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浙东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督机制，是由共产党内部的监督、参议会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多方面的监督形成的。四是以俸养廉。为更好推行廉洁政治，浙东抗日民主政权在弘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同时，实行“俸以养廉的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

再次，形成严格的惩罚机制。廉政建设的保障机制除预防外，还要有惩罚制度，一旦出现腐化分子和腐败现象，就要有严厉的惩罚机制来制止。1945年1月，浙东民主政权颁布了惩治贪污的条例，施政纲领，就提到“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颁布《浙东行政公署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惩治贪污等腐败现象作了具体解释，从而使廉政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 五、浙东抗日根据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开拓未来。“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总结和宣传浙东抗日根据地历史经验，从中得到启示与借鉴，对于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有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具体内容，但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培育了适合时代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的爱国主义精神核心是唤起中华民族觉醒，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高举抗日大旗，同仇敌忾，痛歼日伪顽，勇赴国难，为正义事业浴血奋战、献身捐躯，创下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今天弘扬爱国主义，就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共促国家崛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当前，要紧密结合宁波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把学习贯彻“四个全面”引向深入，为尽快实现“两个基本”目标、建设“四好示范区”而努力奋斗。

2、有利于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保持同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不仅战争年代需要，更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相适应。浙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屹立于东海之滨，就是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结果。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眼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时代主题虽有所转换，浙东抗日根据党政机关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经验并没有过时，依然有其现实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吸收了战争时期合理内核，又容纳了时代精神。这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甚至会走向失败。前些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干群关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所改善。总结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就要发扬当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作风，从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解决群众观念和群众立场的问题，深刻认识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借鉴学习浙东抗日根据地坚持群众路线经验，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新要求，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接受群众监督，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3、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完善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人民民主，依法治理，是我们党一直所追求的，也是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抗日战争时期，浙东共产党人，为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按照“三三制”原则，经过协商选举建立了临时参议会和行政委员会，使一切抗日爱国的阶段、阶层和社会团体，参加到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抗日民主政权中来，保障了人民民主。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也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巩固发展浙东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保证作用。而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这为我们今天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正如董必武指出的：“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制定了许多代表人民意志和符合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尽管它们在形式上较为简单，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但是它们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它们并且是我们现在人民民主制萌芽。”当前，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变革，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原则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统一。

4、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廉政建设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反腐倡廉是一项重要任务。浙东抗日根据地始终重视廉政建设，不断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廉政建设可以从中学到启迪和借鉴。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动真格打硬仗，扫除顽瘴痼疾，取得让人民满意的实效。还要像浙东抗日民主政权那样，采取有力的措施，诸如权力约束、民主监督、严惩贪污等，并结合新的情况，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员干部要继承当年的廉政作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开

(作者为市委党校教授)

## 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 观点聚焦

今年上半年，在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全方位稳定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0%，经济运行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但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我国经济企稳基础尚不牢固，向好势头仍需巩固，中国经济稳增长需精准发力，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扎实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 经济出现企稳回暖的积极信号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处于合理区间，许多指标出现回升势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分析认为，二季度以来稳增长力度加大，后放权、金融综合改革不断取得突破，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双双发力，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这些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出现企稳回暖的积极信号。

在专家看来，随着前期出台的各项稳增长政策和改革措施效果的进一步显现，中国经济有望延续近期的好转态势，下半年经济有望好于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触底反弹的迹象，随着稳增长政策从二季度起开始加码，一些前期的风险点得到有效对冲，预计中国经济三季度会出现小幅反弹，全年增速也能够维持在官方设定的可控范围内。而在曹和平看来，当前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经济下行压力仍不容小觑，要完成全年增长目标，必须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和改革，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激发市场活力。

#### “新三招”保证稳增长后劲

跟以往相比，如今稳增长“新旧动力”转换，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等经济发展新常态密不可分。要保证稳增长的后劲，李克强总理给出了“三招”药方：一要多出深化改革开放的“硬招”，二要多出针对性强的“实招”。三要多出提升发展能力的“新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认为，“新三招”里面，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破除部门利益阻隔，发挥好政府的带头作用，通过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拉动投资，尤其是以PPP模式为主的公用事业投资。目前投资仍然乏力不足，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资本仍然以观望、迟疑的态度居多。以PPP项目来看，有的地方政府“懒政”现象较为明显，缺乏创新意识、责任意识、改革意识，对这种投资模式的认可和参与度都不到位，对于民间资本也缺少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并且缺少对规模较小的民营资本的整合、引导，导致社会资本无法有效调动起来。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指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从6个方面“发力”：一是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二是务实推进“中国制造2025”有效落地；三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消费环境；四是提升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率；五是货币进一步疏通传导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六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 促进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指出，当前，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认识还存有一些误区。有人以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会缺乏认识，对稳增长必要性和意义缺乏正确判断。确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潜在增长率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但中高速的潜在增长率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并不会自动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的过程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主动作为、采取切实措施，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在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实现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只有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力，才能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李伦)

## 阐发优秀传统文化切忌简单化

### 新论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文说，近年来，在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方面，大家热情很高，做了不少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工作还停留在表面或形式上，随意性大，浅而杂。

有人从中国古书中挑选出了24段话，用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相对应。比如，以《桃花源记》中的描述对应“富强”，以“致中和”对应“和谐”，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应“自由”，以“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应“平等”，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对应“敬业”，等等。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一两千年前就有了，那么我们今天做的和说的还有什么新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方式本身就很有“中国化”，和其他国家都有所不同，确

进一步加大对有利于强基础、惠民生的投资。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抗震加固、农村垃圾处理、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投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而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度”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

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竞争不充分，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在不少产业领域我国甚至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工厂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发展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发挥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创造条件，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当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孕育大量新商机、催生众多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业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发展还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约，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

#### 简政放权仍是稳增长“先手棋”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开年以来，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在任期内削减1700多项审批权1/3”的承诺已经提前兑现。

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副主任丁茂战表示，大力实施简政放权，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情，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稳增长”治本的重要手段。截至目前，简政放权主要成就包括：一是审批事项大幅减少，并联合审批、网上审批等给老百姓办事创业提供了很大方便；二是至少在中央层面，采取了不少治本的办法，有效防止反弹；三是中央政府两年就完成了1/3的目标，这个力度是以前没有过的，也给社会明确的信号，给市场主体以信心。

虽然权力清单上减少的项目不断增加，市场却仍有声音表示简政放权遭遇“最后一公里”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存在“放小不放大”、“明放暗不放”等现象，使得这项改革与群众的期待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不光是利益阻隔在“作祟”，还包括下级政府之间权责不明等本身带来的改革困难。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马宝成分析认为，简政放权堵在“最后一公里”，从中央来看，是一些权力部门担心取消和下放权力后自身利益受损、地位降低，所以不愿意放权，造成“对审批很迷茫、对监管很迷茫”的问题；同时，也有地方对上级下放的权利“接不住，放不下、管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基层政府由于硬件设施落后、技术手段跟不上、人才缺乏、监管方式单一等因素，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还不适应。因此认为，要解决简政放权的“提质增量”问题，关键还是要防止下面力度衰减，加强督导检查；同时要注重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解决“梗阻”的问题，抓紧进行顶层设计。

社会和基层期盼简政放权持续发力，更希望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下得了”还需“稳得住”。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指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营业执照+负面清单+政府监管和服务”，只规定市场主体什么不可以做，其余由企业自主决策、依法经营。可以更加注重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大基层服务平台整合力度，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另外，更加注重基层政府在简政放权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基层政府的施政能力。

(李伦)